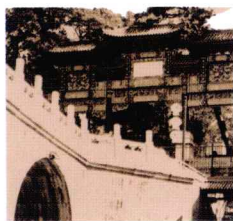


文学语言论争史论 (1915—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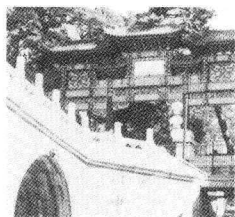


Wenxue Yuyan Lunzhengshilun
(1915—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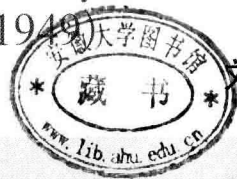
刘 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语言论争史论 (1915—1949)



Wenxue Yuyan Lunzhengshilun
(1915—1949)



刘 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语言论争史论: 1915—1949 / 刘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161 - 2126 - 9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文学语言 - 研究 - 中国 - 1915—1949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510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周小丽
责任校对 王洪强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社 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网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http: //www. csspw. 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刘泉老师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一晃就已经七八年了，虽然她在青岛大学，但我不断能得到关于她的学术成果的信息，她很少主动和我说起这些，只是自己默默地在做。这很符合她的个性，不禁让我想起她在北师大攻读博士期间的情形，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低调，二是执著。低调如前所说，刘泉总体上始终是一个做得比说得多的人，无论平时交谈还是打电话，她都非常简短、简洁，很少渲染，更无夸张。但她心里有数，这就特别表现在她对学术的执著追求上，她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查找资料，都是难度比较大的，她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语言论争问题，这对于学文学的同学来讲，是个硬碰硬的题目，对这些相关问题的理解，来不得半点的主观臆想，任何结论都要靠实打实的材料来支撑。因此，她在查找资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心血，明知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题目，但她一旦认准，就绝不退缩，而是勇往直前地走下去，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刘泉的博士学位论文，集中讨论的是现代文学不同历史阶段所发生的几次围绕语言问题的论争，毫无疑问，语言问题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之一，语言问题的论争在相当实质的层面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深度和品质。可以说语言问题的背后，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新兴思想观念与传统僵化文言模式的一种碰撞，因此，这些关于语言问题的论争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新文学在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和困境，显然搞清楚这些论争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的影响，是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在于，这不能停留在表面的感觉，必须深入到问题的具体层面，这就不仅要对文学发展有准确的把握，还需要对语言本身的演变有精准到位的了解。刘泉在她的论述中，一方面注意到了语言本身演变的具体问题，突出了现代白话在其建构中自身的工具化属性；另一方面也强调，语言论争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不

单单只是作为工具，同时也将不同层面文化观念及思想意识进行汇聚融合，继而被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推动中国文学转型。这也彰显了她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的目的和意义：力图在书写过程中展示语言论争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这一中介作用与根本性价值。

刘泉的论文着重论述了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三场重要语言论争：“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除了运用相关语言学的方法对于问题本身有翔实论析的同时，刘泉还较为注意对这些语言论争背后的时代语境进行考察，同时更是能够抛开以往的文学史叙述逻辑，发掘论争背后的一些历史细节，例如在“五四”“文白之争”、二元对立的背后，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对历史文本的仔细解读，刘泉发现了在新文化派和守旧文人之间，还有对胡适、陈独秀的白话观点最早提出探讨的李廉锜、曾毅、余元澹等人，以及之后对文白转换基本途径进行认真求证的朱希祖、朱经农、任鸿隽等人，这些所谓“折衷”派群体的存在。而这个对于“文白之争”持折中态度的群体，在以往因为被认为“阻碍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因此失去了文学史价值而被以往的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由上面这些对于文学史问题的思考，也引出了她此书的第四部分——文学史叙述与建构中的语言论争，专门对文学史叙述在现代文学建构过程中所发生的作用进行了梳理辨析，这是这篇论文研究从文学史到学术史研究理路的提升和跨越，也可以说是刘泉在研究过程中自我不断思考、提升、完善的结果，这对一位年轻学者而言，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我记得刘泉的博士论文在答辩的时候，得到了多位专家的高度评价，当时她也很激动，我很理解在她的泪水当中，饱含着她这些年的辛劳，现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几番精心细致的打磨就要出版了，出于师生之情，她希望我给她写一个序言，其实作为导师，不是对于所有问题都能发表很好的意见的，这说的是实在话，但是师生情谊难却，我写下以上这些话作为序言，既为刘泉取得的学术成就高兴，更多的是祝愿刘泉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以更扎实的步伐迈上更高的境地。

刘 勇

2012年中秋前夕于北京

目 录

绪论 语言建构与现代文学研究	(1)
一 论题的提出	(1)
二 现代文学发展中语言论争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6)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10)
第一章 “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	(12)
第一节 “文白之争”的历史描述	(12)
一 白话文学观念的提出及其近代渊源	(12)
二 新文化派与“折衷”派之间的辩难与商榷	(25)
三 新文化派与守旧派的持续论争与激烈交锋	(27)
第二节 “文白之争”中的关键性问题	(37)
一 白话文的合法性	(38)
二 文言与白话的属性与功用	(54)
三 白话文的建设与完善	(62)
第三节 对“文白转换”过程的整体思考	(73)
第二章 30年代的语言“大众化”讨论	(90)
第一节 语言“大众化”论争的阶段性的考察	(92)
一 文学用语问题的浮现(1928—1932年)	(92)
二 文学用语问题的深化(1932年前后)	(95)
三 文学用语问题的集中探讨(1934年前后)	(102)
第二节 “大众语”论争中的关键性问题	(108)
一 “大众语”与白话文	(110)
二 “大众语”的实施与发展	(115)
第三节 语言“大众化”方向再思考	(122)

第三章 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的语言问题	(136)
第一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语言本体意识	(136)
第二节 “民族形式”引发的语言资源问题的讨论	(142)
一 民间文艺用语问题	(142)
二 大众日常用语问题	(147)
三 “五四”新白话问题	(150)
第三节 民族意识对现代白话发展方向的整合	(157)
第四章 文学史叙述与建构中的语言论争	(171)
第一节 作为方法论参照的语言论争	(173)
一 语言视野的引入	(173)
二 新文学“传统问题”的阐释途径	(179)
第二节 作为文学史叙述内容的语言论争	(184)
一 文学史对“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叙述的流变	(184)
二 文学史对语言“大众化”“民族化”叙述的趋于 一致	(193)
三 语言观念·文学观念·文学史观	(196)
结语	(201)
参考文献	(204)
后记	(215)

绪论 语言建构与现代文学研究

一 论题的提出

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皆与白话语言的文学化、书面化有着密切关系。正如胡适所言：“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①这虽然是对新文学的初步界定，但从其一贯的发展来看，这一定位其实也构成了新文学发展中最为稳定的一脉，“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40年来，一方面白话文体逐渐代替了文言文；另一方面，白话文本本身也在日益发展、日益丰富。”^②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近百年发展的最重要的成就，便是成功地建构了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建设意义上的语言体统。……语言的自由表达成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最富实质性的成就，都应归功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白话文体统的确立和不断加强。”^③随着时间的流转，新文学的白话形式，“已经很自然也很成功地渗入到普遍的文学和文化生活之中，成为常识、惯性和最普遍的方式。毫无疑问，汉语变革构成了现代文学传统中最重要而又最稳定的部分”^④。这样看来，语言就成为我们由本体角度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渠道。

但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造成了“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不重视语言研究的特定价值所在；而另一方面，也

① 胡适：《导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27页。

②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③ 朱寿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道法体系”》，载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④ 温儒敏：《思想史代替文学史？》，同上书，第21页。

由于白话语言对现代文学而言已经是“常识”性的、惯性化了的，导致学术界往往仅注重从白话的定型状态去品评其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作用，而忽视了对现代白话动态发展过程的整体关注，忽视了对白话构成因素的全面考察，自然也就难以真正深入现代文学研究的本体层面。

回顾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有关白话语言建设的讨论始终贯穿其中。从近代裘廷梁“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倡议到民国初年注音字母的提倡，从“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全面胜出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激进批评家对白话文体的猛烈抨击，从20世纪30年代语言“大众化”观念的全面倡导到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对语言“民族性”、“统一性”的强调，知识分子对现代汉语书面语形态的革新过程，一直同步于新文学自身的演进与发展。其中，由书面语形式的“文白转换”而产生的两大问题，即白话文运动是否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白话在文言、口语、方言、“欧化语”等资源中如何进行选择，则成为历次语言革新中的论争焦点，并持续地影响于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及其学术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语言建构与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依然被广泛重视，成为研究者们审视、重估现代文学特性及内涵的重要参照。如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文学语言”的讨论中，周祖谟指出，“现代汉语就是古代汉语的继续。文言既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它的语法基本上与现代语相同，我们就不能说文言是已经死去的语言。文言中所表现的语法结构与现代语法结构的一致性，正表现出古今语言是一个，现代语就是继承古代语发展来的。”^①并以此为据，批判了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认为“胡适只能从表面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他看到文言有些句法和虚词跟现代语不同，于是就认为文言是二千年前的死语言，把白话和文言割裂成两种毫无关系的对立体。进一步，他又把语言和文学混为一谈，用形式主义的观点把文学分为死文学和活文学两类，凡是用文言写的就是死文学，凡是用白话写的就是活文学。不用说文学不能讲死活，

^① 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载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及汉语教研室编《“文学语言”问题讨论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而评论文学也不能从它所应用的语言来定其价值的高低。”^①表现出对新文学以文白对立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质疑与批判,体现出由语言演变反思新文学的独特立场。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化热”的推动下,现代文学与语言变革的关系由于对传统继承与文化发展的涉及,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如舒芜认为,“文言文和白话文只是不同的两种书面语,并无好坏之分,古文之为古文则是从内容到形式的一个完整的系统,今人文章里吸收文言成分,并不等于复古。”^②提出了白话对文言继承的必要性。叶维廉在其专著《中国诗学》中指出,“在冷却了60年的今天,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字、文学放在更大的历史整体里,把中国文字的表现力和外国文字的表现力比较一下,便会觉得中国文字不但不野蛮,而且精炼,并更接近自然的真质。”^③字里行间为文言正名的深层心理跃然而出。1992年,《文艺争鸣》第3期推出了《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专号》,集中探讨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特定关系,并提出了“汉语文学”的响亮口号,表现出学者们对汉语自身特质及汉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

综合而言,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的反思与重估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热潮,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借助于反省与质疑以白话文运动为代表的语言论争,重估现代文学的性质与成就。如郑敏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中,指出:“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三次面临道路的选择,而三次都与语言的转变有紧密的关联。”认为中国新诗创作成就的不足,是因“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文言传统的断裂所致^④。从而引发了以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为途径,探索现代文学发展脉络并谋求新世纪文学发展方向的思考热潮,标志着对“文白之争”等语言问题的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和价值。其中,以“对‘五四’白话文

① 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载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及汉语教研室编《“文学语言”问题讨论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②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③ 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1页。

④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运动及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反思与重估”^①为立足点，将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某些误区与缺陷，归结为白话建构过程中的缺陷及不足，则成为其中的一个代表性思路。如郜元宝在《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思考》中，曾提出：“语言——在这里首先是作为母语的汉语言文字——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家’沦为交际的工具，这是不平等的‘语言接触’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意识中造成的又一种现代性语言观念，它深刻地制约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品质。”^②揭示了工具论语言观念对中国文学文化现代品格的塑造作用，并体现出一定的批判姿态，就是对上述思路的体现。不仅如此，在学术界看来，对现代文学及语言关系的研究，还有助于深化对文学文化现代转型进程的考察。如张颐武指出，郑敏在《世纪末的回顾》中对白话文运动的重估，是“由语言观的角度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反思”，“它所引起的分歧和争论也不仅仅局限于诗歌领域，而是指向了目前‘知识’发展的前沿，介入了正在兴起的有关‘文化转型’的讨论。它引起人们的关注正是目前中国面临的‘大转型’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投射，也是置身于这个‘大转型’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探索的反映。”^③揭示出现代语言观念的确立在中国文学文化现代转型中的特定作用。

学术界对现代文学与语言建构之间关系的重视，证明了这一视角的形成对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同时也显示出语言学视野汇入文学研究视野的必要性。而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多局限于对现代文学进程中某一阶段语言建构过程的考察，且多脱离了对相应的时代背景与特定的观念动机的发掘，尚不够客观；而仅仅以白话对传统的背离品评新文学的语言缺陷，并就此裁定新文学的天然不足，不重视对白话所承载的多重历史使命的考察，也容易流于偏颇。无论如何，语言建

① 张颐武：《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一个九十年代文学的新命题》，《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② 郜元宝：《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③ 张颐武：《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一个九十年代文学的新命题》，《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构与文学发展的纠结，在根本上源自二者对现代品格及现代意识追求的一致性。汪晖指出：“现代白话的形成和倡导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现代性的历史产物，我们至少可以在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理解现代语言运动与现代性的关系。首先是现代语言运动是一个反传统的、科学化的和世界化的语言运动，其次是现代语言运动是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语言的运动。”^①而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其“持久的影响之一”，“是为现代书面语的形成创造条件、规范和习惯，进而形成一种‘普遍语言’。这种普遍语言在功能上为同一国家提供了语言上的依据，同时，在取向上，又与西方语言逐步接近，即所谓科学化、逻辑化、拼音化”。^②因此，必须立足于语言与文学共同的变革追求，发掘对二者施加影响的理念因素，并探寻新兴观念在二者之间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与途径，确立语言与文学对现代思想观念不同的反应模式及相互间的制约与互动，才能真正深入新文学的根本，由新文学的本体层面，以及白话建构的整体视角，对现代文学的白话标准、白话特征、白话实践，作出全面客观的考察。而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语言论争，作为体现语言规律与时代思想需求的重要载体，作为文学语言的形成途径，都成为我们开展由语言建构进入文学研究的极佳渠道。

鉴于此，本书将立足于现代白话的建构过程及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以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三场重要的语言论争，即“五四”时期“文白之争”、30年代语言“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的语言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三场语言论争的缘起、发展，总结论争中的焦点性问题，发掘其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现代知识分子不断演变的语言观念，以及论争中所确立的语言形式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从而能够以一种整体化的历史眼光，全面论述现代白话的建构过程，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独特品格、研究方法的重要影响，力求确立一种经由对现代白话的整体考察而深入至新文学本体的研究思路。

①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08页。

② 同上书，第1516页。

二 现代文学发展中语言论争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学术界对语言论争在现代文学进程中的研究有着漫长的历程与丰富的成果，概括来看，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层面的研究：

第一，将语言论争作为现当代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研究内容。这一层面的研究展开较早，以李何林的研究最为卓著。他于1939年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以及二三十年代“大众语”运动中各家各派的主要观点，评价公允，材料翔实，并基本奠定了此后对语言论争进行叙述的文学史模式，即将语言论争统摄于文学思潮演变的统一背景之下，以对论争中各方观点的描述，来印证文学思潮主流的确立及其先进性，但相对而言忽视了对语言自身规律性作用的关注。其他如刘炎生著《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廖超慧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吴立昌主编《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等等，均基本沿用前述李何林的研究模式。

第二，以语言论争中所体现的新型语言观念作为文学观念的体现。袁进在其专著《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1996年版）中专列一章“文学语言的变革”，由论争中表现出的语言观念的雅俗对立，结合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分析，论述了对新的文学观念生成的影响，是对语言观与文学观之关系的较为充分的研究。由包忠文所主编的《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1992年版），也以一章的篇幅论述了西方的语言本体论观点，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理论背景，惜乎缺乏对二者关系更为具体深入的论述。其他如李荣启的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嬗变》，以对百年文学语言论争的回顾为主线，勾勒了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四条发展轨迹，提纲挈领，论述翔实，可以视为对现当代文学语言观念发展的纲要式研究。

第三，随着语言学理论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日渐深入，有关文学语言论争的研究也获得了新的视角，并摆脱了早期为思潮发展提供论据的附属地位，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1988年《文学评论》第1期以“语言问题与文学研究的拓展”为总题，刊出了一组从语言视角切入当代文学研究的笔谈，表现了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密切关注。在日趋自觉

的语言意识推动下，对语言论争的相关研究分化为四条研究支流：

其一，以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视角重新解读语言论争，成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所注重的研究潮流。如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汉语形象美学引论》、《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等专著，对近50年文学语言状况及20世纪末中国文体变革包括语言变革的潮流，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剖析。宋耀良著《十年文学主潮》（1998年版），响应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和“寻根小说”中有关语言问题的探讨，提出了汉文学语言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要求对白话文运动的某些观点进行再思考。

其二，以语言学理论研究现代文学中语言观念的流变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成为现代文学尤其是新诗研究的主要方法。如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1999年版）、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2003年版）等专著，都详尽论述了历次语言讨论中有关新诗语言建设的问题，反思了工具论语言观造成的诗歌语言透明化、简单化、诗意不足等缺陷。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2005年版），较为熟练地运用了“话语”理论，从研究诗歌的声律与音乐性入手，认为在现代汉语的语言条件下，诗人只能根据“内在”情绪的律动而选择一种既贴合这种情绪本身的节奏、又符合现代汉语特性的形式，是从诗歌的内在思维和听觉效应出发对诗歌的外在音律和节奏作出的析理与规定，涉及了新诗的诗性思维及其本质属性等本体性的问题。

其三，以语言学方法考察语言论争，还为现代文学发生学的研究提供了依据。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2003年版）是其代表，该书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认为现代汉语的确立也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的确立，现代文学的发生在深层的原因上根源于语言的变革，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品格的确立提供了语言理论方面的依据。其他如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2003年版），也提出“五四”前后关于“语体变革”的探讨，是现代文学启动的动力因素之一，肯定了白话文运动对新文学确立的重要价值。

其四，以现代语言学理论考察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语言论争，并将两者的误区及缺陷共同归结为对传统继承的不足，则成为当代学者考察中

国文化现代转型问题的重要手段。郅元宝、郑敏、张颐武、旻乐、文贵良、罗志田等众多学者，均从文化继承、文化更新的立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国学”思潮的推动下，对现代文学发展中以白话文运动为代表的语言论争进行了反思。郅元宝发表了《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思考》、《为什么粗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与现当代文学》、《母语的陷落》一系列论文，从剖析现代语言论争所形成的语言观念入手，论述了在工具论语言观念的支配下，语言与思想感情遭到分隔，以及汉语优美的诗意传统在现代的失落，从而导致现代文学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直达现代中国人生命体验与意识存在的特性。郑敏的观点与此相仿，而且具体至诗歌语言困境的研究中，她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一场关系到 21 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的讨论——如何评价汉语及汉字的价值》等论文，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传统汉语丰富的诗意价值与诗性特征，如何因白话文运动对文言文的严厉抨击与坚决摒弃而逐渐丧失的过程。张颐武的论文《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一个九十年代文学的新命题》、《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旻乐的专著《母语与写作》，分别从文化立场的角度，指出 20 世纪的语言论争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知识分子们未能对汉语和汉字的全部潜能及可能性加以自觉的探索，他们在语言观上的简单立场也抑制了汉语文学的独特文化价值与美学意义的展现，而作为能够与“西方中心”抗衡的话语策略，只有发掘汉语的母语文化资源，发挥本土符号的潜力和能量，才能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独立的存在位置，寻觅到汉民族生存的终极意义。文贵良则发表《解构与重建——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以“话语”理论为根据，探讨了“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出了开放的、自我出场的白话话语模式，取代了晚清的文言权力话语模式。文贵良在另一篇论文《大众话语：生成之史——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描述之一》中，揭示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隐形大众话语对白话话语的取代过程。罗志田的专著《裂变中的传承——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专列一章“文学的失语：整理国故与文学研究的考据

化”，探讨了白话文运动等语言变革所造成的学术语言变迁，对语言论争进行了深入反思。

综观学术界对语言论争的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较重视对语言论争的阶段性的考察而忽略了对其前后进程的整体研究。比如，学术界普遍关注“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但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语言论争相对而言重视不足。自然，白话文运动作为新文学的发轫，有利于学术界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新文学的特征，而白话文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语言主张，因为承载着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的深刻思考，自一提出，就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因此，白话文运动为历来研究者的考察中心，是理所当然的。但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语言论争实则是一个整体进程，每一阶段的论争主题都有其独立的时代背景及观念体现，既体现着前一阶段经论争而形成的语言观念、语言形式的影响，又有着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型观念基质，并奠定了下一阶段语言发展的走向，因此，只有对每一阶段的语言论争均予以关注，才能形成对现代白话发展的整体认识，才能够全面考察语言演变与文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次，研究姿态上表现出“解构”与“肯定”的两极对立。前者以郅元宝、郑敏、张颐武、旻乐、文贵良、罗志田等学者的文化反思为代表，表现出对现代文学语言中传统文化内涵及诗意特性流失的忧虑；而以高玉、陈方竞、范钦林等为代表的学者，则注重从语言学、发生学等角度肯定乃至捍卫白话文运动等对于现代文学的特定作用。不同的研究姿态源自不同的研究立场与理论基础，都是不可忽视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语言论争虽然广受关注，但多数学者的研究思路仍然局限于由语言观念的研究渗透至对其内在的文化思维方式与文学文体发展等问题的阐释，而对于在文化转型的现代背景下，以建设现代汉语文学语言为目的，反思、总结历次语言论争的得失优长，论证、阐释、发掘其中有利于语言建构及文学发展的积极因素，再现新型语言观念的发展轨迹及实际运用状况，却似乎是一个少人问津的领域。更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解构还是肯定的研究，几乎都立足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采取非破即立的态度，这虽然有助于研究的深化，但对已有百年历史的语言论争来说，树立建设性的研究姿态，遵循破中有立、破立结合、立

为首要的研究宗旨，既有利于充分利用既往的研究成果，也能够为新世纪有关语言论争的研究拓展空间。

第三，较重视对语言论争中结论的探讨，多从语言论争的结果入手，研究其在文学语言发展、文学文化建设层面的作用，而较少关注结论、观点所由形成的论辩过程与其中观念的流变。这就使对语言论争的研究失去了历史的维度，难以客观全面地界定其中蕴涵的观念机制。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经由对论题的分析及研究概况的考察，本书确立了对现代文学进程中的语言论争的研究思路。

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是以新兴思想观念与僵化文言模式之间的内在矛盾为契机，在不断演变的社会文化转型中，所展开的一个现代化过程。这就要求文学必须以各种方式不断回应现代中国多变的观念倡导与文化实践，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而现代白话在其建构中，由于其工具化属性的凸现，而更容易体现出时代观念的发展，能够将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新兴导向统统凝聚于自身，并进一步地将自身的变动体现于文学发展与文学研究中。可见，语言论争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实则具有将不同层面文化观念及思想意识会聚融合，继而运用于文学实践、推动文学转型实现的重要作用。本书则力图在书写过程中展示语言论争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这一中介作用与根本性价值。

因此，立足于白话建构与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影响与紧密联系，本书将以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三场重要语言论争，即“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为研究对象，引入适当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结合对语言论争所由形成的时代语境考察，在梳理、辨析历次语言论争中所建构的语言观念及所凝聚的多维思想意识的基础上，发掘不断发展的时代意识对语言观念与实践的影响，总结汉语书面语的现代品格的生成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考察论争中所形成的白话观念及思维方式，在现代文学的语言资源、语体形态、表达风貌等方面的实际体现。